

伊拉斯谟与早期印刷业

郭灵凤

(北京大学历史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西欧早期印刷业与人文主义运动之间存在一种互动关系。在新学术运动和宗教虔诚复苏影响之下,许多印刷商除了谋取商业利润之外兼具复兴古典文化、传布基督福音的学者情怀;另一方面,人文主义运动的传播、学术研究方式的变革、具有自觉意识的人文主义学术集体的形成均渗透着印刷业的影响。

关键词: 早期印刷业;学者式印刷商;伊拉斯谟;人文主义学术

分类号: K546.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18(2002)03-0060-06

17世纪英国哲学家法兰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曾经断言:印刷、火药和磁石,这3项古人所不知的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1](103)}单就印刷业对西欧的影响而言,“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带来了西方文明史上知识生活条件方面最激烈的变革。它在教育以及思想交流领域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它的影响波及人类活动的各个部门。”^{[2](186)}因此,缺乏对早期印刷业的考察,则很难全面、正确地认识近代早期欧洲的信息传播、文化变迁以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等诸多社会文化运动。从中世纪的手抄本制作到近代早期的印刷业,世俗化商业化的图书生产如何改变了中世纪教士垄断知识传播的局面?早期印刷商

与学者是以何种方式合作的?他们的合作怎样推动了学术事业的发展?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回答。本文尝试在文艺复兴时期印刷业产生、发展背景下,分析北方人文学者伊拉斯谟与早期印刷商的合作这一个案,初步探讨早期印刷业对人文主义学术的影响,以期对以上问题的回答有所裨益。

一、西欧印刷业的产生 与学者式印刷商

15世纪下半叶,西欧的书籍生产事业从抄写者的案头移至印刷商的作坊,这是图书生产领域的一场革命。活字印刷术的出现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以往各种历史因素在长期渐进积累基础上的一次质变性飞跃。^①“任何一个创造性的想法变成一项有用的发明有两个先决条件:一、将凭空

收稿日期: 2001-12-19

作者简介: 郭灵凤(1974-),女,内蒙古包头市人,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 60 ·

设想变为物质形态所需的设备和材料的存在；二、对这项发明的社会需求，至少是思想准备。”^{[3](123)}

印刷术是此前亚洲、欧洲各种革新发明的集大成者，纸张、油墨、印刷机、金属活字范是必不可少的物质载体。然而，促使印刷术产生的一个更为关键的社会条件是中世纪以来图书生产的逐步商品化。

中世纪图书生产的主体是修道院或大教堂附设的缮写室。制造手抄本主要是为修道院或教堂图书馆提供藏书，接受王公贵族的请托、充实他们的个人收藏。同时，辛苦抄录的过程也是神学家探究神圣知识、揣摩上帝话语，修士们补赎罪过、为天国效劳的过程。因此，教会控制下的图书生产基本上是宗教性的。但是读者群的不断扩大使图书生产的商品化成为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随着大学的兴起，12世纪校园内外出现了由抄写者和书商(stationers)构成的新型图书生产阶层。他们在“佩卡制度”(Pecia System)^{[4](481)}组织下为大学教师、学生和托钵僧团提供用书。“作为工具的图书，变成了产业的产品和交换的商品。”^{[5](79)}从13世纪中叶起，波伦亚、巴黎、牛津等地的大学图书工场以及后来米兰、佛罗伦萨、鲁昂、伦敦等大城市中高度组织化、职业化的书业行会、公司逐渐取代修院缮写室成为手抄本生产的主体。世俗性、商业化的图书生产基本上以市场为导向，以谋求商业利润为目标。因之，读者对知识日益增长的需求与商人追逐利润的动机相结合，导致了知识传播的职能逐渐从教士手中转移到书商手中，这种转移为大规模生产图书提供了一种制度化保证。

15世纪下半叶，由于手抄本生产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图书市场的需求，印刷术应运而生。这正是贝尔纳的论断“印刷术的全部价值，只是在同一内容的大宗廉价复制本有了需要时才被人感到。”^{[6](197)}作为中世纪书商的继承人，从事早期印刷业的印刷商无疑也是以赚取商业利润为生产动力的，同时他们还是应用新兴生产技术和市场条件的先驱，因此一些学者把他们归入早期资本家的行列。但是这样一种划分容易导致种种与经济人行为相联系的错误推论，进而忽视早期印刷商在推动同时代科学、文化发展中所起的作用。^{[7](22-23)}因此进一步认识印刷业产生的社会条件及早期印刷商的性质必须考察当时的图书市

场，它为印刷术的产生提供了一个必需的社会环境。^②

十五六世纪刺激印刷术产生、支持印刷业发展的图书市场有着深刻的学术、宗教背景。印刷术发明之时正是智识活动异常活跃的年代。投身文艺复兴“新学术运动”的人文学者热烈欢迎印刷商为其提供大批价格低廉、版本各异的拉丁文、希腊文古典著作以及基督教文献，以便参考、校订、整理。印刷业创造了一个令学者心醉神迷的黄金时代，拉伯雷借高康大之口赞美道：“印刷的精美和实用，在我那个时代，肯定说是神圣启示的……现在全世界都有有学问的人，知识渊博的教师，藏书丰富的图书室。我以为柏拉图的时代也好，西塞罗、巴比尼昂的时代也好，哪个时代也没有现在求学这转容易。”^{[8](271)}印刷术产生的宗教背景是康斯坦茨、比萨、巴塞尔三次公会议之后的宗教虔信复苏。在吉拉德·格鲁特(Gerard Groote)倡导的现代虔诚运动(Modern Devotion)中，宗教书籍的生产是重要内容。他建立的两个教团，即温迪塞姆团(the Windersheim Congregation)、共同生活兄弟会和姐妹会(the Brethren and the Sisters of the Common Life)，以及新兴的卡修詹会(Carthusians)、改革后的本尼迪克教团(Benedictine orders)纷纷致力于“以双手布道”的神圣使命，13世纪中叶衰落的修院缮写室在15世纪后半叶重获生机。与此同时这些宗教团体还频频光顾印刷作坊，印制大量宗教学术著作及通俗虔诚读物，新兴的印刷业获得了一个强有力的需求宗教书籍市场的支援。

在“新学术”运动和宗教虔信复苏的背景下，从事早期印刷业的印刷商也不单单是以商业收益作为书籍生产的惟一目标，他们中的许多人兼具学者情怀，或以光大新学术、复兴古典文化为己任，或以文字荣耀上帝、传布基督福音为从业动力。最著名的学者式印刷商是威尼斯印刷商阿尔杜斯·曼努提乌斯(Aldus Manutius)。阿尔杜斯年青时在罗马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并曾出任贵族子弟的家庭教师。15世纪90年代他来到威尼斯，决心投身印刷业，翻译出版所有重要的希腊经典著作。1493年威尼斯著名印刷商陶瑞萨尼(Andrea Torresani d'Asola)出版了阿尔杜斯的拉丁语法，1495年2人正式成为合作伙伴，创立阿尔丁尼出版社(Aldine Press)。这家出版社由陶瑞

萨尼和皮埃尔·法朗希斯科·巴巴瑞哥(Pier Francesco Barbarrigo)合资兴办,阿尔杜斯主持一切重要的学术、出版事务。1501年阿尔杜斯发明了以人文学者草体(或称意大利斜体)铅字印刷的八开本图书,为读者提供了常备便携版经典作家著作。阿尔杜斯出版社很快成为威尼斯甚至全欧洲最为生机勃勃的出版社,1495至1505年期间出版图书100余种,以希腊经典为主,也有拉丁文著作和一些有名的意大利文作品,在意大利人文主义学术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9](45-46)}早期学者式印刷商的另一个代表是巴塞尔的约翰·阿曼巴赫(Johann Amerbach),出版西方教会四大拉丁教父的全集是他毕生的宏愿。他在世时已出版了安布罗斯、奥古斯丁的文集,并着手编辑哲罗姆全集。他去世之后其子继父业,继续这一计划。他的儿子布鲁诺(Bruno)和巴西尔(Basil)回忆道:“他常常被这样的愿望所鼓舞:如果早期教父时代那光辉夺目的神学能够复兴,这些佶屈聱牙、索然无味的繁琐哲学就会黯然失色,我们基督徒就会变得更加智识通达、信仰纯正。”^{[10](234)}

正是这样的学术抱负与宗教信仰成为学者与印刷商合作的基础之一。在一个拥有先进印刷设备、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的印刷作坊中,印刷商身兼数职:既是出版者又是发行人,还要编定索引、摘要,编纂词典、编年史。他需要各行各业的学者、专家,如教授、医生、销售商、画师、译者、图书管理员等,以备顾问。因此印刷作坊成为文人学士荟萃之地,外国翻译家、政治流亡者的庇难之处,新潮学问研究机构,以及各类知识交流的场所。16世纪欧洲著名学者、“人文主义之王”鹿特丹人伊拉斯谟就曾经先后与意大利的阿尔丁尼出版社、巴塞尔的弗洛本出版社合作出版《格言集》、希腊文《新约》翻译本等著作,这些事迹成为文艺复兴时期北方人文主义运动的重要内容。

二、伊拉斯谟与印刷商的合作

1506年伊拉斯谟接受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的御医乔万尼·巴蒂斯塔·波伊瑞欧(Giovanni Battista Boerio)的委托,陪同他的两个儿子前往意大利波伦亚(Bologna)大学,并监管其学业。借此机会,伊拉斯谟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人文主义学

术发源地——意大利。他游历意大利各城市,结交权贵、拜访学者,并且同著名的威尼斯印刷商阿尔杜斯·曼努提乌斯建立了联系。1507年10月、11月伊拉斯谟与阿尔杜斯两次通信,商讨再版他翻译的《赫卡柏》(Hecuba)和《伊菲革尼亚在奥利斯》(Iphigenia in Aulis)这两部欧里庇得斯(Euripides)戏剧剧本的有关事宜。这两封信中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伊拉斯谟一再提到“名声”这个词。他在第一封信中赞美阿尔杜斯的成就,“至于说到名声,阿尔杜斯·曼努提乌斯这个名字无疑将为今天以至后世所有神圣文学的热爱者所称颂。”^{[11](207)}当他提到巴黎的印刷商巴德(Josse Bade Ascensius)一年以前出版了他的这两部戏剧译本,而且满意地销售一空时,抱怨道:“但是我的名声并没有因此提升,因为这个版本到处是错误的。”^{[11](208)}他认为如果这两个戏剧译本能够用阿尔丁尼出版社独创的意大利式斜体铅字印刷,“我的劳动成果就会传诸永远。”^{[11](208)}在这里,伊拉斯谟把学者的名声与印刷商的名声联系在一起,学者通过印刷业使其作品流传、获得学术声誉,印刷商则通过襄助古典学问、出版古典文献赢得不朽声名。不仅如此,他还在第二封信中与阿尔杜斯讨论翻译过程中的种种学术细节,^{[9](44)}这表明他认同印刷商是学者队伍中的一分子。第二,伊拉斯谟把自己的作品当做进身之阶。伊拉斯谟在第一封信中表示他愿意无偿提供译稿,出版社只需送几本印好的书作为报酬。第二封信中,他又催促尽快将书印出,以便他到罗马时可以将此书作为礼物送给结交的显贵。^{[9](44)}他还在《伊菲革尼亚在奥利斯》正文前附送一篇致英格兰坎特伯雷大主教沃汉姆(Warham)的序言。应该看到,伊拉斯谟在这个时候仍然主要是依靠中世纪传统意义上的庇护人维持生活的,他与印刷商之间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而非雇主与职员的关系。

1507年12月,阿尔杜斯出版了伊拉斯谟翻译的这两部戏剧。在这以后他们又互有书信往来,阿尔杜斯同意出版伊拉斯谟手头正在修订补充的《格言集》(Adagiorum collectanea),并力邀他到威尼斯协助工作。因此伊拉斯谟放弃了去罗马的计划,1508年1月初前往威尼斯为《格言集》的出版做准备。毕图斯·瑞纳努斯(Beatus Rhennus)在《伊拉斯谟的一生》这篇传记中提到一段小插曲:伊拉斯谟抵达威尼斯阿尔杜斯的印刷作坊

后坐等良久,一直无人理睬。阿尔杜斯正忙着订正校样,他认为好奇的参观者对工作是一种可恶的打扰。但得知来访者是伊拉斯谟时他异常高兴,在岳父陶瑞萨尼的家里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客人。^{[12](37)}从此,伊拉斯谟成为阿尔丁尼学会(Aldine Academy)及阿尔杜斯印刷作坊中的一员。这个学会也叫做新学会(New Academy),是由一班精通希腊文,协助阿尔杜斯出版希腊经典作品的学者组成的学术团体,1502年成立。其成员有希腊流亡学者加努斯·拉斯卡利斯(Janus Lascaris)、马库斯·穆苏鲁斯(Marcus Musurus)以及意大利学者西皮欧·卡特罗马库斯(Scipio Carteromachus)、巴蒂斯塔·英格纳日欧(Battista Egnazio)、皮德罗·贝姆波(Pietro Bembo)、吉罗拉默·阿林德罗(Girolamo Aleandro)等人。接下去的9个月中伊拉斯谟就生活、工作在印刷作坊中。他与吉罗拉默·阿林德罗共居一室,这位学者后来成为大权在握的红衣主教。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景象,在繁忙、嘈杂的印刷作坊中,30余人共同工作,学者们从希腊文手抄本里搜检资料、修订文稿,阿尔杜斯和印刷工人们奔走校样、定稿、印刷。

对于他们共同从事的这项事业,伊拉斯谟在1508年版的《格言集》中做出了评价,即格言杂文Festina lente。这条格言的意思是“慢慢快起来,开头别太快”(Make haste slowly)。伊拉斯谟追溯了这个词条的古典来源,认为阿尔杜斯用锚与系船柱的图标作为出版社的标志正是表达了这个意思。他用很长的篇幅赞美阿尔杜斯复兴古典学术的不懈努力,“这是一项赫尔枯勒斯式的奇功,……使隐匿的出世,使幽闭的彰显,使灭亡的复活,为了弥补中世纪的学术断层,竭尽全力修复残缺破损、谬误百出的古典手稿,尤其是那些视一枚金币重于整个古典文献宝库的庸俗印刷商所造成的错误。”^{[13](180)}他宣称“阿尔杜斯正在建造一座无边无际如世界般广阔的图书馆”。^{[13](181)}几年以后伊拉斯谟在这篇格言杂文后面续写了一段,细致地描述了阿尔丁尼版《格言集》的准备情况以及阿尔杜斯和新学会的学者们对他的慷慨帮助:

那个时候,我,一个荷兰人,在意大利监管我这本《格言集》的出版,那里的每一位学者将从未付印的古典作家的作品提供给我,只要他们认为我或许会用到的著作,毋需我请求,就会无偿地提供给我。阿尔杜斯自己也无私地向我敞开他的宝藏。加努斯

·拉斯卡利斯、巴蒂斯塔·英格纳日欧、马库斯·穆苏鲁斯、福拉特·乌巴努斯(Frater Urbanus)都是这样善待我。我得到了许多未曾谋面亦不知其名的人士的帮助。我初到威尼斯之时只带着一部作品的草稿,这些刚从古典著作中摘出来的格言,语句零乱、文理不通。从这样一个基础做起,对于我这个作者和阿尔杜斯这个印刷者来说,都是一项冒险。约摸9个月之后我们大体完成了工作,在此期间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沉重如磐石般的困难。如果同行学者不为我提供资料,想象一下我的景况会多么惨痛。这些资料中有柏拉图的希腊文著作,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Lives)和《道德论丛》(Moralia)(这两部书在我的工作完成之际出版发行);阿瑟内乌斯(Athenus)、阿弗索尼乌斯(Aphthonius)、赫莫杰尼斯(Hermodorus)的Deipnosophistai附评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Rhetoric)附格里高利·纳兹安仁(Gregory Nazianzen)的注解;阿里斯泰德(Aristide)连同注解,关于赫斯奥德(Hesiod)和忒俄克里图斯(Theocritus)的短篇评注,以普鲁塔克的名义搜集的谚语,杰罗姆·阿林德(Jerome Aleander)借给我的是署名阿波斯陶里乌斯(Apostolius)的一个人搜集的谚语。还有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有的我已经记不清了,有的没有必要提及。以上所记载的从未刊印。”^{[13](185-186)}

1508年9月阿尔丁尼版《格言集》正式问世。它是在1500年初版、1506年巴德第二版基础上大大扩充的新一版《格言集》,共500余页,对开本。初版时的819个短条目已经扩充为3260条,并附有长篇评注,新的书名是《千条格言集》(Adagiorum chiliades)。扩充的内容均来自阿尔杜斯及新学会学者提供的希腊文资料。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是知识界合作的产物,也是传播古希腊文化遗产的工具。玛格丽特·曼·菲利普斯称它为“新时代之书,诞生于印刷机的轰鸣中,同时若没有复兴古典时代的狂热,它的产生也是不可想象的”。^{[13](181)}

三、印刷业对人文主义学术的影响

“任何一种技术都趋向于创造出一个新的类环境。……技术环境不仅是人群的消极承载物,而且是重塑人群和其他技术的积极工艺程序。”^{[14](序言)}对于16世纪的人文主义运动来说,新兴的印刷业不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新的传播、保存知识的技术手段,在更为重要的意义上,它参与塑

造了这场古典文化复兴运动的发展。

首先,印刷业直接推动意大利人文主义学术传播到北方。人文主义运动肇始于14世纪的意大利,之后南风北渐,15世纪90年代“北方国家的公民和学者们开始摆脱经院哲学和骑士文化的传统而在寻求一种既是人文主义的又是宗教的教育类型”^{[15](91)}^③,在佛罗伦萨新柏拉图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创造出了人文主义的一个新类型:圣经人文主义。这是现代文艺复兴史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④。当具体讨论到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的传播过程时,通常的说法是通过北欧学子留学意大利以及北方王公贵族延聘意大利人文学者到宫廷中当秘书或教师等途径,意大利人文主义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在北欧扎根。但是也有学者注意到了印刷业在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传播中的所起作用,如E. g. 赫施、伊丽莎白·埃森斯坦^{[7](180)}。根据毕图斯·瑞纳努斯在《伊拉斯谟的一生》中的记述,当威尼斯印刷商阿尔杜斯准备出版欧里庇得斯和索福克勒斯作品的希腊文注释本时,有人提醒他,这样做相当于鼓励“野蛮人”留在家里研究学问,会使到意大利求学的人数减少。^{[12](48)}事实证明阿尔丁尼出版社的书籍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鲁道夫·阿格里克拉(Rudolph Agricola)之后的一代北方学者不必离开家乡就可以研习、教授希腊文。

第二,早期印刷业引起了中世纪以来学术研究方式的变革。在抄写时代,古希腊罗马或基督教经典文本通过苦役般的抄写、凭借各种记忆术流传下来。避免抄写错误是修院缮写室的首要纪律:“缮写神法之圣明裁决与教父之庄严词句者端坐此处。愿诸位下笔谨慎不可滥添无用之词,以免因愚妄笔下铸错。愿诸位不辞琐细校改文本,健笔飞驰修正谬误。”^{[16](791)}利用手抄本进行研究的学者若想参考不同的书籍,必须游学四方,许多人往往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只好专注于得之不易的单个文本,潜心揣摩,详加评注。到了印刷时代,学者式印刷商的印刷作坊本身成为一个人才济济的研究机构,工作的重点不再是避免抄错单个文本的字句,而是在批评研究各种文本的基础之上,刊印一个令人信服的定本。在各地图书市场上以合理的价格可以得到各种版本的书籍,继承中世纪解经传统的学者面临着研究方式的变革,他们可以参阅各种书籍进行相当规模的学术

研究了。比如16世纪下半叶的圣经学者普拉丁(Plantin)原本准备对1517-1522年的《康普路屯先多种方言合刊本圣经》(Complutensian Polyglot)略加修订,但完工时却是一部包括五卷正文、三卷参考文献的煌煌巨著,其参考文献中有希腊文、希伯来文、阿拉姆文、叙利亚文的语法和词典。

早期印刷业对人文主义运动第三方面的影响是人文学者依托学者式印刷商的出版社形成一个互助协作的学术集体,通过希腊罗马古典著作及基督教经典书籍的编辑、出版事业,实践他们的学术宗旨,并且紧密团结为一个的统一的、有自觉意识的学术阵线,与经院哲学家分庭抗礼。对于北方人文学者来说,他们共同的学术追求是复兴早期教父时代的神学,将典雅文学(Bonae Litterae)与神圣文学(Sacrae Litterae)和谐统一^{[17](104)},用“典雅文学宣讲……我主基督和上帝的荣耀”^{[17](105)}。他们所反对的是圣经注释学者忽视希腊文、拉丁文的学习,墨守代代传抄、以讹传讹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以及许多经院哲学家废弃研读圣经、抛弃早期教父的学术传统,为一些繁琐琐碎的枝节问题争辩不休,从而使神学堕落,陷入危机。由《愚人颂》的出版而引发的伊拉斯谟与马丁·道普(Martin Dorp)之间的那场著名的争论,正是反映了圣经人文学者与经院哲学家双方的斗争。伊拉斯谟的《愚人颂》1511年首次在巴黎出版,到1515年它已经成为坊间流行的畅销书,并且引起了以鲁汶大学神学家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敌视,他们认为这部书伤风败俗、胆大妄为,公开批判正统神学并影射教会权威。双方的敌对通过将马丁·道普致伊拉斯谟的批评信付印而公开化,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笔墨官司,伊拉斯谟和托马斯·莫尔均卷入其中。^⑤但是圣经人文主义者对经院哲学及教会的批判并没有实现其整合、改良基督教社会的愿望,分裂教会的新教徒掀起的宗教改革运动湮没了主张和解的圣经人文主义。

注释:

①“15世纪下半叶”只是一个便于叙述的抽象时间界限,早期印刷业一度曾与抄写并存,因此从抄写到印刷的过程是渐变还是突变,学界存在争议。本文不拟讨论这个问题。参见伊丽莎白·埃森斯坦:《当代历史文献中所见的印刷术发明》(Elizabeth L. Eisenstein, *The Advent of Printing in Current Historical Literature*),《美国历史评

论》第75卷3号(1970年2月),第739、740页。

②导致印刷术产生的社会条件多种多样,如东征奥斯曼土耳其的十字军就曾经派人到古藤堡的印刷作坊,要求他们印制赎罪券等。本文受内容局限,只讨论图书生产的商业化以及十五六世纪的学术、宗教背景。

③但是也有不同看法,如赫伊津哈在《中世纪的衰落》提出古典主义在中世纪的思想中长成,许多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特征在十四五世纪法兰西、尼德兰骑士文化中也有体现。参见约翰·赫伊津哈著,刘军等译:《中世纪的衰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④但是根据丽莎·扎丁的研究,马丁·道普并不是经院哲学家的代表,而是人文学者队伍中的一分子,由他挑起的这桩事件完全是人文学者设计的一场表演,目的是向读者表明《愚人颂》的写作意图,为人文主义正名。参见丽莎·扎丁:《伊拉斯谟:以文字为业》(Lisa Jardine, Erasmus, Man of Letters),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0页。

参考文献:

[1]培根.新工具[M].许宝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Gilmore. The World of Humanism[M].转引自 Elizabeth L. Eisenstein.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28.

[3]Douglas C. McMurtrie. The Book: the Story of Printing and Bookmaking[M]. Oxford, 1976.

[4]Joseph R. Strayer, editor in chief. Dictionary of the Middle Ages[Z]. vol. 9.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7.

[5]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M].张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M].伍况甫等译.科学出版社,1959.

[7]Elizabeth L. Eisenstein.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8]拉伯雷.巨人传[M].成钰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9]John C. Olin. Erasmus, Utopia, and the Jesuits [M].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94.

[10] Collected Works of Erasmus, vol 61 [M]. 转引自 John C. Olin. Erasmus, Utopia, and the Jesuits [M].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94. P8.

[11]Barbara Flower tr.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of Erasmus [M]. 附见于 Johan Huizinga. Erasmus and the Age of Reformation [M]. F. Hpmann tr. London: Phaidon Press, 1957.

[12]John C. Olin ed. Christian Humanism and the Reformation: Selected Writings of Erasmus [M].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57.

[13]Margaret Mann Philips. The 'Adages' of Erasmus [M]. Cambridge: Robert MacLehose Company Limited, 1964.

[14]Marshall McLuhan. The Gutenberg Galaxy [M]. Toronto: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1965.

[15]G. R. 波特,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卷:文艺复兴1493-1520[M].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6]Rosamond McKitteridk.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2: c. 700 - c. 900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7]Cornelis Augustijn. Erasmus: His Life, Works, and Influence [M]. J. C. Grayson tr.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1991.

【责任编辑 于默颖】

Erasmus and Early Printing Trade

GUO Ling-feng

(History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re wa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 between early printing press and humanistic scholarship.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ew Learning and religious piety, many printers aspired to revive classical culture and to spread Gospel, as well as to acquire commercial profit. On the other h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inting industry exerted deep influence on humanist group and their study. This paper centers on the work of Erasmus in Aldine Press, and discusses the corporation of humanists and scholar printers.

Key Words: early printing press; scholar printer; Erasmus; humanistic scholarship